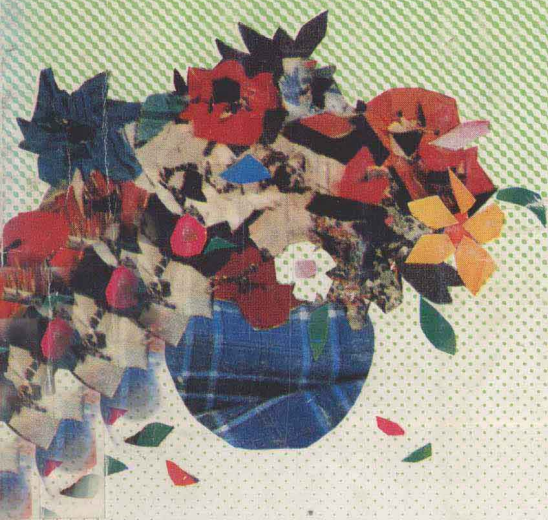


彭斯远 著

异彩纷呈的多元格局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异彩纷呈的多元格局

彭斯远 著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鄂)新登字04号

异彩纷呈的多元格局

彭斯远 著

*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30毫米32开本 6.375印张 2插页 100 000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7—5353—1166—0

I·178 定价：2.4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在新时期文学的百花园中，儿童文学无疑是一朵盛开的花！近年来，我国的儿童文学正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在儿童文学的创作方面，无论是童话、诗歌、散文或是儿童小说，都有大批好的作品问世。作家队伍更是几世同堂，人才济济，为少年儿童提供了精美的精神食粮，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一致称赞！

与此同时，总结儿童文学的创作规律，辨析中外儿童文学的异同，正确估价当前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现状，廓清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渊源，是势在必行。我们高兴地看到：建国以来直至新时期，许多理论工作者在儿童文学领域有不少建树，并对指导儿童文学创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勿庸讳言：与繁荣的儿童文学相比，儿童文学理论的探索显得过于冷清，或者说远远落后于创作。基于此，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经过精心努力，编辑、出版了《儿童文学新论》丛书，著者从儿童文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研讨。有的对新时期儿童文学思潮作了历史性透视；有的对中外儿童文学进行

了平行的比较、分析；有的对儿童文学的审美功能作了观照；有的对具体的文学体裁（童话、小说）进行了新的阐释。这套丛书，立意新颖、探索性强，逻辑严密，思辨色彩浓厚，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艺术理论的研究是一项繁重的精神劳动，理论研究的不可重复性，决定了它得不断探索。正是这不断的探索，才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努力。培养青年理论工作者是促进理论创新的重要一环。我们高兴地看到，这套丛书，出自中青年作者之手，大多是儿童文学理论界的新面孔，作者新；而他们又多年耕耘在儿童文学的沃土中，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给儿童文学界吹进了一股新鲜空气，观点也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前出版业资金紧缺，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的情况下，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本着从未来出发，为下一代着想，不惜重金出版了这套丛书，给中青年作者提供了一个畅所欲言的阵地，这还是一个创举。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对推动儿童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对推动儿童文学创作的进一步繁荣，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叶君健

1989. 5. 8.

目 录

卷头语：面临扭曲与断裂的焦灼·····	(1)
一、疗救孩子心灵的创伤·····	(7)
二、社会急切的呼唤·····	(20)
三、被重新唤醒的审美意向·····	(33)
四、意识流卷起滚滚波涛·····	(45)
五、情节淡化发起的挑战·····	(61)
六、孩提最需要的是故事·····	(78)
七、阳刚之美在蜕变中复苏·····	(92)
八、教师形象塑造的多层次立体化·····	(108)
九、重铸人类“游戏精神”·····	(122)
十、奔突在回归现实的开阔地带·····	(136)
十一、动物快感向童心美感升华·····	(148)
十二、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张扬·····	(163)
十三、异彩纷呈的多元格局·····	(177)
尾声：不是句点，而是省略号·····	(191)
愿我国儿童文学理论更加繁荣·····陈 深	(195)

卷头语：面临扭曲与断裂的 焦灼

新时期中国儿童小说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其美学价值，始终为人所关注。

它的崛起，并非先知先觉心血来潮的随意点拨，也决没有像在餐桌上嚼食牛排那般舒适和惬意。新时期儿童小说范式，是在民族文化机体的阵痛之中得到蜕变而逐渐磨练成型的。

众所周知，“四人帮”极力推行的极左思潮，已把中华大地弄得满目疮痍。文学艺术，亦被他们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挞伐得奄奄一息，毫无生气。儿童文苑几乎是一片废墟。

可是，文学的历史决不能断裂。

面对十年空白，欲求寻找生路的儿童文学编辑和儿童小说家们，只好把求助的目光移向五十至六十年代中期的我国儿童小说林。他们欣喜地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儿童小说，即那些从我国五四儿童小说革命传统，和茅盾、叶圣陶等文学研究会前辈作家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遗传基因发展而来

的儿童小说，其总体面貌如同孕育和滋生这批艺术之花的民族土壤一样，始终给人以清新欢快和欣欣向荣的生机感。小说家们透过自己的作品，热情讴歌孩子们挣脱物质和精神枷锁，以及翻身做了国家小主人的喜悦，描写少年儿童校园生活的欢乐，和他们开始走向社会现实初尝人生醇醪的甜美与劳作的艰辛，像肖平《海滨的孩子》、杲向真《小胖和小松》、张天翼《罗文应的故事》、马烽《韩梅梅》以及当时尚属少年习作的刘绍棠的《青枝绿叶》等小说，均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

然而，缘于对“正面教育”原则的机械搬用，这时期的儿童小说存在着单一的正面人物塑造，和无冲突故事等编造倾向。有的儿童小说从“阶级斗争工具”与“教育工具”观念出发，已演变为政治口号的移步换形，演变为社会活动中某些临时性、突击性中心任务的形象化宣传。小说因成为政治运动的简单传声筒或某一教育口号的庸俗图解，从而失掉了原本应该具备的美学内蕴。

另一方面，由于我们上千年封建统治所留下的深刻历史积淀，不可能被五四运动反封建的扫帚一下彻底清除干净。潜在意识形态的顽固性，远比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困难得多。所以我们年轻共和国的奠基，并不可能根除长期以来盘踞在人们脑子里的那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及旧的习俗观念。

作家脑子里的此种观念，必然带来儿童小说创作中“成人中心”的恶劣影响。当历史的沉积岩禁锢和压迫着作家大脑的时候，面对作品应予处理的孩子形象与成人形象的关系，作家就势必难于摆脱幼稚的孩子只有在成人教育影响下才能顺利成长的基本思维格局。按此种不可更易的模式去结撰故事和塑造形象，便使人物和情节流于概念化。

回顾过去，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不但和篡党篡国的“四人帮”及其所推行的极左思潮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而且为此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显然，这之中也包含孩子们的可贵贡献及其惨重的牺牲。儿童小说作家当然不能面对民众的英勇斗争，以及他们遭受的寒冷、饥饿、创痛和一切精神的折磨而闭上眼睛。风雷激荡的现实生活为文学提供了各种社会场景与不同人生际遇——无论是英雄的、悲壮的、惨烈的、残酷的、庸俗的，还是其它——这完全够一代作家去尽情描绘和表现的了。因此，可以说，包括儿童悲欢在内的现实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也为儿童小说家们的艺术表现，提供了展现才华的最好舞台和天地。于是在现实主义精神朗照下的新时期儿童小说，跨出的第一步就是对孩子伤痕的痛切暴露，对制造这一社会悲剧之罪魁的义正辞严讨伐，和对悲剧追根溯源的深刻反思，继此之后，小说家们更表现出对孩子教育以及对与孩子有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注，如此

等等，不一而足。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向前推进，儿童小说家在文学观念迅速更迭、嬗变和不断吸收、融纳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的基础上，对其主题内涵的重新审视与大力开掘，对其风格、形式和表现手法的更新与调整，这便带来了新时期儿童小说对“游戏精神”的大力呼唤，对吸取意识流及其它众多现代派表现手法加以东方化改造的执着探索，对重塑具有时代特征的儿童形象及成人形象的艰苦追求，对某些新兴文学样式（如儿童纪实小说）的重视与构建，以及对昔日未敢轻易涉猎的某些题材禁区的努力开拓；等等。

新时期文学的造山运动，使儿童小说这个陈旧的文学板块发生变异，从而形成了大片大片的我国儿童文学的奇峰秀水，雄山大川的新型地貌。我国当代儿童小说的确从内容到形式，从题材到表现手法，从个人风格到地域流派的尽情开掘与大幅度更新，不但极大地提高了为数众多的作者积极投入的儿童文学创作整体艺术质量，而且也有力证实那具有深刻意义的“双百”方针的进一步贯彻落实，正在促使我国儿童小说向着多元并存，万木竞秀的艺术高峰疾进。

当然，我国新时期儿童小说的发展与繁荣，不仅表现在质上，而且也体现在量上，拿它与儿童文苑里的常见文体——诸如童话、诗歌、戏剧以及孩

孩子们喜欢的其它文学样式相比较，可说小说，特别是供十二三岁以上孩子们阅读的少年小说始终占据着国内各家儿童文学刊物的主要篇幅，为杂志争取读者信誉而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此基础上，全国各地出版部门还纷纷选编作家们创作的优秀长、中、短篇儿童小说专集或多人合集，其种类之多、印数之大，为其他文体所不及。

据调查，从1981至1983的三年中，全国的十家主要儿童文学刊物，共发表短篇小说一千六百篇，中篇小说一百六十篇。姑且按此统计类推，新时期以来，全国所发的儿童短篇小说应在五千篇以上，中篇亦应不少于450之数。可见儿童小说创作的发展势头，不容人们低估。

同时，我们还不应忽略这一事实，就是我国当代儿童小说创作所提供的艺术经验，实际上已有力推动和促进了其它门类的儿童文学创作。近年间在我国贵阳、烟台等地曾多次召开名曰“当代儿童文学发展新趋向”的理论研究会。在这些会议上，不但与会者的热门话题离不开小说创作，而且好些论者的观点与见解可说更是莫基于对儿童小说现状的考察与反思。这一事实也许不无偏颇，但由此足可看出小说在儿童文苑里所具有的举足轻重地位，以及它对其它文学样式的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以上所举事实无一不表明，新时期以来，儿童小说的发展与繁荣，正代表和标志着我国整个当代

儿童文学创作的腾飞！当代儿童小说正以昂奋的态势和巨人般的步伐跨过十年浩劫所形成的历史断层而在迅猛疾进。

同时，从历史纵深发展的眼光看，我国新时期儿童小说在思想艺术上的多元整合，既是对长期笼罩我国的封建儒学文化所形成的大一统思维定势的突破，也是对自五十年代以来儿童小说所沿袭的“教育工具”论、“从属于政治”论等极左束缚的鼎故革新。仅从新时期儿童小说美学思维空间的极大拓展而言，无论它在我国源于五四运动的现代儿童文学浩浩江流里，还是在我国整个儿童文学王国的巨大版图上，都将划下一条闪烁着童心光泽的长长印痕。

这就是本书对近十余年来我国儿童小说发展梗概及思想艺术特征所勾画的一个大体轮廓，也是本书对新时期儿童小说发展的人文背景（即它所面临的严重断裂与传统基因及其扭曲）所作的一点历史回顾。沿着这个粗疏浏览的思维轨迹，如果我们的读者们乐于下马驻足，对儿童小说再作一番具体而微的过细考察，你将不难发现，儿童小说园林即使不为大手笔的文学批评家们所关注，它却仍是一个被孩子们认同的晶莹玲珑的艺术世界！

一、疗救孩子心灵的创伤

1977至1978年，是作家们重新获取自由、试笔创作的草创期。在这特定时代里产生的揭批“四人帮”的儿童小说，显然带有一种难于抹掉的时代模式。

由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理论主张已在不少作家脑子里留下根深蒂固的烙印，一时难以根除，所以他们即使处在揭批“四人帮”的活动之中，仍不自觉地表现出“从路线出发”和按“主题先行”固有模式进行故事结撰的倾向。这类试笔之作，虽然没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却激起了群众对进一步揭露极左思潮罪恶的向往与渴求，为大批较有艺术性的“伤痕小说”的出现，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一系列颇具影响的伤痕之作的发表，标志着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家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我们知道，鲁迅在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浪潮中，借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结尾，针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而《班主任》却以拯救青少年心灵创伤的悲天悯人，于七十年代末期再次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这一呐喊的意义已不仅仅局限于揭露“四人帮”，而锋

芒所向，是直指浸润于社会每一角落里的极左路线与极左思潮。

从接受美学的观念看，每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和确立，总离不开作家——创作主体，和读者——接受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因此，这里有必要先对这些“伤痕小说”创作者的情况作些剖析。

七十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儿童小说作家可分为下列三个层次：一是因极左思潮而长期被迫搁笔的老作家（包括一部分从1957年开始即遭坎坷命运的“归来者”），如任大霖、肖平、杲向真、刘绍棠等；二是因长期担任教师工作获得灵感走向文学创作的中年作家，如刘厚明、夏有志、罗辰生、庄之明等；三是近年来脱颖而出的青年作家，如曹文轩、陈丹燕、刘健屏、秦文君等。上列老中青三类作家在生活经历和思想素质上的共同特征是：命运坎坷，经历复杂，长期接触下层民众和涉世未深的孩子，文化水准较高。如此履历又必然造就他们那诚恳、善良、踏实与同情弱者、憎恨残暴等可贵思想素质。

具有如此个性和思想、文化品位的儿童文学作家，对于源自“五四”文学革命“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精神，显然具有一种乐于承继的内趋力，激发他们为当代少年儿童奋笔疾书的热情。

此外，我们也不能忽略对小说接受对象的审视和关照。这时期的小读者同他们的父辈一样领略了极左思潮的挞伐，他们中不少人遭受到冻饿、失学、

流浪的痛苦。因为那些伤痕之作易引起他们的共鸣。有着广大少年儿童读者如此迅捷而热烈的心灵呼应，儿童伤痕小说能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吗？

是的，面对着十年浩劫所造成的苦难，面对着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我们的小说家决不能用无聊的唱和和虚伪粉饰来装点生活。于是，自大学生卢新华开始，一批年轻作者在创作中勇闯禁区，把昔日由于崇高和疯狂，忠贞和愚昧，青春和野蛮的错综交织所酿成的血泪故事捧到读者面前。应该说，卢新华这署名为“伤痕”的在艺术上还显得较为稚气的小说，却因为它在文坛上第一次表现出对灾难岁月所郁积的心灵苦痛的情感宣泄，而在我国小说发展历程中显示了不可替代的价值。伤痕文学的得名渊源于此，正是对它所开启的一种文学思潮以及在小说美学拓展上所建树的功绩的充分认可。

在作家们记忆的荧屏上，还深深叠印着昔日血泪斑驳的生活轨迹。因此，儿童伤痕小说在取材上，首先表现出父母离异、家庭解体给孩子造成的从生活到思想，从身体到精神的巨大苦痛。这之中，大学生陈传敏的《爸爸》（《儿童文学》79年11期）可算一篇出类拔萃之作。《爸爸》写一个中学生的父亲因被诬为反党分子而冤死，当儿子正沉浸在对父亲的怀念中时，母亲却要儿子承认她为他选择的一个新爸爸。儿子虽接受不了这一现实，但几经情感折磨，小主人公终于与新爸爸融洽起来。可就在这时，继

父却因坚持与“四人帮”进行斗争而惨遭逮捕，小说在孩子心灵上再一次烙下伤痕……当然，该小说除了表现家庭肢解给孩子带来的精神苦痛之外，还隐含着妇女改嫁和老人再婚等一系列涉及伦理道德观念的深刻内涵，所以这类小说在思想主题上不仅于孩子有教育意义，即令对成人读者也不乏深刻的认知价值。

儿童伤痕小说的艺术视野，并不仅仅局限于表现干部家庭的兴衰变化。原来它在对现实进行美学观照时，在作家那艺术透镜里占据其更重要位置的，乃是覆盖着社会普通公民杂沓脚印的城市大院和山村茅屋。除了表现父母因婚姻关系变故而导致家庭解体的之外，也有的伤痕小说写父母由于冤假错案被批斗关押或其它原因导致家庭破坏，从而把孩子推向悲苦的流浪生涯。年轻女作者庞天舒的《我和小黑》（《芒种》80年9期）以沉郁凄楚的笔调叙写一个因躲避“反革命”家庭的灾难而被送往亲戚家抚养的女孩子，怎样过着灰姑娘般的悲惨生活。孤独使她与一只丑得可怜的黑猫交上朋友，遭人白眼的经历又使她结识一位因死去的丈夫犯有“里通外国”罪而过着穷困生活的善良老大娘。这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终于在生活的炼狱里接受现实的“馈赠”和启迪而步步走向成熟。

其次，儿童伤痕小说更表现了“文革”动乱对孩子造成的心灵污染与性格扭曲。王路遥笔下的唐不

知因当中学校长的父亲被批斗死去而变成“一个刀枪不入的孩子”(《儿童文学》81年4期),他成天领着一帮小哥儿们把班里闹得乌烟瘴气,当老师去开导他时,他却以风凉话反唇相讥。而刘岩笔下那位三好学生金莹莹竟因受父亲庸俗卑琐人生态度的影响而变成世故虚荣的小滑头,现实生活里的歪风邪气早把她塑造成一棵“被扭曲了的树秧”(《少年文艺》81年2期)。

小主人公性格的扭曲固然是坏事,但有时这又可能催生着孩子性格的早熟。当然,此种童心的过早失却,对成长中的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心灵的挫伤。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勉强的、过早成熟的儿童——是精神上的畸形儿。任何过早的成熟都不啻是对童贞的破坏。”(见《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4页)这种辩证统一于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奇特现象,往往在一些儿童伤痕小说里也有着出色的表现。

动乱社会结出的苦果本应由造成社会动乱的成人来摘取,但有的小说却传神地描写了天真无邪的孩子正在品尝这枚人生的苦果。尤风伟的《草莓》(《中国文学作品年编:1981儿童文学选》)和王代轩的中篇《浅浅的天河》(《中学生文艺》84年3期)都是表现父辈在“文革”中结下深仇大恨而由下一代来化解的。他们为填平父辈感情沟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当我们读到《草莓》关于大春冒着可能遭到父亲打骂的危险悄悄救回落进山坳的邻家女孩小芳时,